



蔣瑞藻集

小說考證

上冊

蔣瑞藻 著
蔣逸人 整理

浙江古籍出版社





蔣瑞藻集



小

說文
考證

上册

蔣瑞藻 著
羅逸人 整理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小說考證 / 蔣瑞藻撰; 蔣逸人整理.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11
(蔣瑞藻集)
ISBN 978-7-5540-0716-7

I. ①小… II. ①蔣… ②蔣… III. ①古典小說—小
說研究—中國 IV. ①I207.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71613 號

小說考證

蔣瑞藻 撰 蔣逸人 整理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 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況正兵
責任校對 余 宏
責任印務 樓浩凱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豐源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張 21
字 數 800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540-0716-7
定 價 88.00 圓(全二冊)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蔣瑞藻先生像

屏提居士蒋瑞藻（孟洁）夫人何奇龄女士像



何奇龄女士像

出版說明

這是一部供研究我國古典小說、戲曲之用的資料書。全書分正編、續編、拾遺三部分，包括自金元以來四百七十餘種小說、戲曲的作者事蹟、作品源流和分析評價等方面的資料（也包括部分清末民初翻譯小說的資料）。所徵引的範圍頗為廣博，有文集、詩話、曲話、筆記等，不下數百種，其中一部分是目前不易見到的書籍或散見於報刊上的文章，還有編者自著的《花朝生筆記》（未刊行）及同時代人的稿本。資料頗為豐富，對小說、戲曲研究者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魯迅先生曾在《小說舊聞鈔序言》中對本書作如下評價：“取以檢尋，頗獲稗助；獨惜其並收傳奇，未曾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時有異同。”正道出其長短所在。

本書曾在《東方雜誌》連載，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五十年代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又利用舊紙型重印三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曾標點出版，今納入“蔣瑞藻集”，以商務印書館單行本為底本標點出版。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4 月

先父蔣瑞藻生平軼事追述

蔣逸人

前 言

先父謝世於一九二九年，其時年三十九虛歲，我爲幼子僅一歲半。雖不知其音容，但思念之情倍於諸兄姐。自幼及長，常向先母、兄姐、親友及從文字資料中探求先父行狀。雖日積月累有所遞增，但仍概而不全。我之兄姐分別服務鐵路、金融、紡織等行業，筆述皆非其所長，因此這一責任似非我莫屬。因先父謝世過早，且寡交遊，雖有著述傳世，而在我筆述未面世之前學界幾無一人知其生平。一九五一年我從東北來杭州工作後，每逢假日都在浙江圖書館孤山古籍部閱讀，因此得識閱覽部主任、史學家、目錄學家夏定域先生。夏擬將浙江文人的著述按不同姓名分別存放。囑我筆述先父小傳供設置卡片，因限定字數，故極爲簡略。其後謝國楨先生來浙圖查閱資料，提到蔣瑞藻自署爲諸暨人，但不明其生平。當謝見到我所作的《小傳》後，認爲過分簡略，知我在杭州，即請浙圖派員來我家，促我面晤。適我外出而未遇，謝請夏轉

言，望我詳述先父生平，在報刊上公開發表。夏既遵謝之囑，又有同感，因此促我寫成《蔣瑞藻生平及其著述》一文，經《浙江學刊》的主編謝實森先生審定後刊載在該刊一九八四第五期上。一九八五年《浙江社會科學信息》總二期刊載周玉的文摘《一位鮮為人知的浙江學者蔣瑞藻》，我認為“鮮為人知”四字，在其時極為恰當。一九五七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再版商務印書館曾版行的先父所作《小說考證》，其時先母尚在世。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擬重加標校出版《小說考證》（其實僅標點更新未校一字），出版前囑我寫一篇作者傳略，為與原書文體相近，以文言文為宜。因此我遵囑用文言文寫成五百字左右的《蔣瑞藻生平述略》附印於書後，此書於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版。如上文所述，我為先父所作傳略已有三次，其中為浙圖所作《小傳》，因夏先生謝世而亡失，而刊載於《浙江學刊》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小說考證》書後的《述略》遂為學界全文轉載、廣為引用、評述或加改寫。先父的生平遂初步為學界所知。周采泉先生所撰載於香港版《文匯報》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三日的《我國小說史的拓荒者——蔣瑞藻》，《文獻》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的《蔣瑞藻的事迹和貢獻》二文中提到《蔣瑞藻生平述略》等，我父親的生平“才像出土文物一樣，引起文壇矚目”。

我在退休前忙於職事等原因，乏暇收集先父生平資料，所有老家藏書及已版行和未版行的先父著述都焚於日寇兵燹。我歷年的收藏盡毀於“文化大革命”，因此在上述二、三篇傳略下筆時近乎兩手空空。至今重讀舊作，認為均屬概而不全。前些年見到胡適先生的《四十自述》，深受啟發，他把他的父、母親的家庭情

況、人物都說得清清楚楚，更明說其父母結合過程，這是衆多自述中少見的。我的外祖父是主動送女上門，且對先父助力甚大，故在此不厭其煩地提到我曾見過一次的外祖父，或屬贅言，亦不宜割舍。

生平與岳家

先父蔣瑞藻，又名鵬漸，字孟潔，浙江諸暨店口鎮屬村黃嫁埠人。生於清光緒十七年（1891）農曆三月十二日，是日舊稱花朝節，因號花朝生，自題其書房爲驛提齋，又號驛提居士。家庭薄有祖傳田宅，世代以讀書爲業，當時亦可稱“習舉子業”，但前代直系無一人中舉。僅一人曾爲武義、東陽、鄞縣的縣學教諭，所謂“縣教諭”僅僅是縣學中爲首的教席，無行政實權，不能視同晚近的縣教育局長。其後各代多爲庠學生、國學生等等，皆困頓科場，退而教育族內子弟，爲家塾之塾師。多代積累，家中頗多藏書。先父從孩提時起就在先祖父執教的家塾中就讀古文和詩詞。九歲喪父後，家塾請來一位八、九里之遙的澣山村姓蔣的老先生繼任。這位老先生曾教過先祖父，父、祖謝世後，我多次見過，被尊稱爲太先生，因此不知其名。太先生享高壽，雖步履蹣跚，每年都來我村兩三次，在我家中餐，並將學生們的贈送物聚集在我家，由先母着人肩挑到他家。先母告知我，這位太先生學識很有限，只配啓蒙。先父在孩提時已讀書識字，經先祖父教導又勤於自學，待太先生來到我村時，先父之所知已超過太先生，因此只在太先生執教的家塾中停留不久就回家自學。其時店口鎮的保福寺開辦了一個名爲明誠學堂的新制學堂，先父的祖母是店口鎮人，就通過

其娘家把先父介紹到明誠學堂就讀。這個學堂聘請的教師，有本地的讀書人，也有外地來的教師。除也讀古書外，更有數學、格致、英文等新課程，有閱覽室，可見到綫裝書以外的報刊雜誌。據先母說，先父在明誠學堂只讀了半年左右，但得益匪淺。首先是他得知綫裝書以外有許多報刊，從中能知道一些新的知識，自己有什麼新的見解，也可以筆述後通過報刊發表，也瞭解了一些學術界的情況，開闊了眼界，因此自己就訂閱了不少報刊。其次是知道了除國學以外還有許多門類的學科，他對數學、格致等不感興趣，但對英文很感興趣，從此自學英文。據先母及兄姐說我家存有一些英文書籍、字典，說明先父通過英文的啓蒙教育和自學能閱讀英文書報，但一生中沒有說過一句英語。事實上即使能說幾句，因先母所識字不多，兒女幼小，當時也無人能聽懂。雖然在明誠學堂得益匪淺，但這個新制學校課程仍以古文為主，這在先父看來實在太粗淺，因而停學。停學的另一原因是他發現店口鎮的不少家庭是所謂“累代書香”，通國學的人不少，且多藏書。其時這個十多歲的年輕人已遍讀我家累代的藏書，也讀遍了本村各家的藏書，而店口鎮各家的藏書更遠在我村之上。因此他就離開明誠學堂住在祖母的娘家，向店口鎮的藏書家借書閱讀。而這些藏書家多數不肯把書出借，說既然有近鄰的外甥愛讀書，可到家去閱讀，但書不準携出門外。因此先父早餐後到這些家庭的書房，中午須回祖母的娘家中餐，中餐後又回去坐讀。藏書人家或有點遠親，就留他中餐。多數人認為這個年輕人的讀書之多、知識面之廣實屬少見，因此不久這個陳家外甥的名聲也就在當時的店口“知識界”傳開了。先父在店口鎮逐家坐讀中不僅接觸到前所

未見的古籍，摘錄了一疊疊的資料，並與我母親締結了婚約。

我的外祖父何乃普，是紹興朱家塢人。早先紹興分爲山陰、會稽兩縣，據說他家可稱山陰的首富。當時人們稱他爲乃普先生或乃普店王。不僅擁有較大的莊園（這樣的莊園在我村和店口鎮的大宅都不可與之相比），有較多的田地、山塘，還有造紙作坊，且在紹興城區開了幾家紙行（即紙張貿易行）。他有五個兒子和幾個女兒，其中一個兒子上過大學，但畢業後和其他幾個兄弟一樣在家做寓公，不好讀書，不思進取。乃普先生眼看自己的兒女沒有希望，想尋一個學有所長的女婿，算是半子，以償夙願。他在店口鎮有親戚，就拜託代爲物色。店口鎮的舊式讀書人就向他推薦了先父。乃普先生從二十五里外的老家來到店口鎮先父，祖母的娘家，會見了先父開門見山地直言我想把愛女作爲你的妻室。這一年先父僅十六歲，先父說我學業未成不想娶親。乃普先生已瞭解先父的家庭情況，說我知道你生長在一個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同輩兄弟不只你一人，你愛讀書，大家庭中一個子弟想大量購書，即使有錢也是辦不到的，所以你纔到店口鎮來借讀。假使你娶了我女兒，你要什麼書，我都給你辦到，紹興沒有到杭州、到上海去買，再買不到我派人到全國各大城市給你去搜求。先父聽了這一承諾喜出望外，說我很願意，但必須得到家母和祖父母同意。乃普先生說這一切用不着你費心，你在店口鎮安心讀書，一切事情由我安排好了。乃普先生就密鑼緊鼓地進行了，他開了一個庚帖（內容是先母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時辰），請託店口鎮一位“體面”（即鄉村中略有名望）的人到蔣家，說山陰乃普先生擬將女兒爲你們的長子、長孫之妻，只要“八字”合了，一切聘禮之類全免。

蔣家家長是知道四十里外山陰何家概況的，立刻書寫了先父的“八字”，當天請瞎子排“八字”，一排告合，這件婚姻就大致定局。

婚姻定局後外祖父派人把幾個“經折”送到先父手中，這裏有必要說明“經折”是什麼。時間已經過了一百多年，現代人已不知“經折”為何物了，它是一個特製的小記事本，或與佛經有關。是用一張長可達一米左右、寬十二—十五厘米的厚紙製成（當時無厚紙，是用二到三層的紙粘合的），每隔四—六釐米一摺，疊合成一定厚度的紙板，底面各加硬頁，外加布面封套。使用時從封套中取出舒展成一張長紙條，用畢可按原折痕重疊納入封套中。封套外粘有標題紙片，用以註明內容。這種經折可書寫不少內容納入衣袋中，體積較小，便於攜帶。這種起源於佛教徒的“經折”，後來廣泛地用於商業活動中的賒銷。舊時較大的商號向常年購物的殷實客戶發出蓋有店章的經折，購物時不必付現金，只在經折上記賬。每逢清明節、中秋節或年節以後派員到客戶人家收賬；同時也廣泛用於家庭作錢穀出入的記錄。先父拿到經折後，在每一行上寫書名，下寫作者，着人給外祖父。外祖父就着人到各處買書。

與此同時外祖父派人到我家，查看了先父的書房，並測量了開間和進深（這就是先父後來的驢提齋）。囑木工為先父製作書櫥，從四十里之遙運來，在未見新娘和嫁妝之前，多只新的空書櫥已布置在書房中了。這件事曾被我家鄉的村人引以為怪。到我長大後，聽先母說，每次外祖父派人外出買書回來，他都親自點收，叫採買人一面捧出書唸書名及本數，過目後在經折的書名上用毛筆竹套蘸上紅印泥蓋上一個標記，說明買到了，然後分批送

到我家。先母還說她嫁到蔣家後，外祖父派來一個人，不見先父只見先母，解開外衣的腰帶取出一本用油紙包着的書交給先母，說乃普先生爲了買這本書派人跑了內地幾個省幾個老城市才買到，連買價和盤川已值幾畝田了。油紙是外祖父親自包好的，外衣腰帶上的結也是他打的，並叮囑行走熱了不準鬆開腰帶，更囑先母不許將此書購置經過和花費告訴先父，恐被先父知道，從此不再要求岳父買書。愛婿至此，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據我所知，外祖父謝世後家道逐漸中落，除兒子們只知享受不思進取、鋪張浪費等原因外，爲先父大量購書也是原因之一。

外祖父與先父有約：凡有文章發表或有著述版行必須立刻送上。先父著述送達後，外祖父接讀喜不自勝，放置在床頭枕邊，白天讀過了，臨睡也在翻閱，足見翁婿情深。先父與兄弟分炊以後（其時我尚未出生），外祖父來我家一次。他發現我家的三間兩廂的二層木結構房屋被書擠壓，生活空間不足，就建議在我家老屋南面的菜地上再建造一幢木結構房屋。先父母考慮到家庭經濟力量而躊躇不決，但外祖父已決定了。不久他根據地塊大小畫了一張草圖送上，接着大批木材運到菜地上了，不多日一位東陽木工領班到了我家來開工了，不久三間帶室內走廊的木結構二層樓房就豎立在老宅南面。除木材是外祖父提供外（這種舊式房屋的主要建築材料就是木材），其他磚瓦、沙石等是就地採購的。就地採購的非主要材料和建築工人的工資由誰支付，我不知道，但完全可以說我家兩處房屋，這舊的是祖傳，新的主要是外祖父的贈與。日寇侵入，老宅被燒，新屋成爲一家栖身之所。先父謝世後，我隨母去過外祖父家一次，生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見過外祖父。

父女倆相持號哭，其聲撕心裂肺，嘶啞喘息，我雙手抱先母之膝，極感恐怖。先父謝世後不久，身高體健的外祖父也告別了人世。翁婿之情深厚如此，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先父謝世時，我蔣家已有五世代藏書，加之外祖父爲先父大量購買，其後先父執教於上海及杭州又大量購書。因此藏書總量以汗牛充棟來形容，尚嫌不夠。特別珍藏的宋元明版古籍不少（先父特地交代先母的說：有些古籍當時是一塊銀元一頁）。我見到還有用多隻木箱存儲的名人字畫，我沒有開箱細看所以不知其爲何物，只見到掛在書齋中的少量對聯，依稀記得書寫者的姓名有蔣智由（觀雲）、鄭孝胥、金澤榮（後來我才知他是韓國學者）等等。我家這許多藏書和名人字畫，都在抗日戰爭時期，被日寇用來助燃我村啓新碾米廠所存儲柴，燃化爲灰燼。

以上所述有偏離主題之處，下文將敘述先父本身事。先父和外祖父在店口鎮約定娶其女爲妻時十六歲，次年即公元一九〇七年完婚，時先母十八歲。嫁妝豐厚，我蔣家花費極少。外祖父還特地派了一個中年的已婚女性隨行，以照料新娘的起居。我成長後多次面晤其人，尊稱她爲“送嬭嬭”。交拜成禮後，新娘以羅帕蒙臉，由送嬭嬭扶將踏着一隻隻連續鋪地的麻袋（不是紅氈，麻袋象徵代代相傳）送入洞房。夫妻雙雙坐在床沿，送嬭嬭代爲關好房門後暫離，後回去再看，發覺房門大開，新娘靜靜的坐在床沿，那塊紅羅帕仍蓋着臉，新郎不見了。她問新娘：“新郎到哪裏去了？”回答是不知道。送嬭嬭在書房中找到新郎，他在專心讀書。送嬭嬭催新郎去安息（這“安息”是送嬭嬭的原話，我們諸暨人無此方言），新郎說請你侍候她先睡好了，我自己知道什麼時間安

息,而且今後你都侍候新娘用餐(三餐都是送嬤嬤從廚房送入新房,由新娘獨自用餐的),今後睡覺不要來管我。送嬤嬤侍候新娘卸妝入睡後離去。兩個人都不知道新郎是何時進入新房,蜷着身子睡在新娘腳邊的。大約過了半個月,送嬤嬤問新娘:“你看到過新郎嗎?他是怎麼樣一個人?”新娘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他何時進房入睡,有時也感到腳邊有人,但未見其人。送嬤嬤問你想見見嗎?回答是見見也好。時至清晨送嬤嬤一把拉新娘到南窗口,指指一條田間小路(我村稱之為金家田塍,是一條鋪着石板的田間小路,大於一般田塍),說你看在田間漫步那個就是他,身材略高但極瘦弱。因為有一定距離,新娘看了後說:“好像是個未成年的大孩子,但面目不清。這種不交一言的夫妻生活過了好幾個月。其後外祖父叫送嬤嬤回去一趟,目的是想瞭解一下女兒出嫁後與女婿及長輩們相處的情況。送嬤嬤的報告使先外祖父母這對老夫夫妻大為驚異,就派人與蔣家長輩聯繫後,用兩頂轎子把新郎新娘接到他們家了。可能是外祖父對先父作了教育,其後才有我的長兄出生。

我在青少年時痴迷於古籍,只要一手執卷,任何旁人的言談都充耳不聞,有時與先母同坐在桌邊,她大聲叫我也不一定聽到。送嬤嬤來我家做客一住幾天,她很勤快也主動為我家做一些家務,她結識的鄰里也三三兩兩來看她。以上所述的先父母新婚異聞,在她們的聚會中談到的不只一次。也有人向先母提到你的小兒子在旁,或有所不妥,先母說無妨,這孩子像爹,在看書時即使敲鑼鼓放爆竹他也是充耳不聞的。實際上這時我也在好奇地聽她們談往事,但姑作不聞。因此我不僅對先父母的往事一清二

楚，就是我对其他前輩們不足為外人道的往事，也比同時代的人知道得多。

不久，先父的祖父母謝世，兒女就分炊了。分炊是一件繁瑣的事，要分配房屋、田地和家庭器用等，先父只提出一個要求：我的書房是不搬的，存書應歸我所有。分炊後，先父也不顧問家事。先母說有一次特意對先父進行考試，說今天買了二斤魚，每斤單價二角，應付多少錢。先父馬上回答說四角。先母又問假使是二斤半，每斤二角五分，先父就算不出了，說我去書房用筆墨算算再說，先母說只準心算不準用紙筆，他就張口結舌了。他更不知道祖父母留給他有多少田地，有多少現金或待還的債務。在家庭中的地位妻子是家長，他像是一個大孩子。但先母對先父非常尊敬，伉儷情篤，一生都稱他為孟潔先生而不名。我婚後的家庭和先父母的家庭有些相近，到今天我家的戶口簿上戶主是我妻，我只是家庭成員之一。

我曾在《蔣瑞藻生平述略》一文寫過“先父世居僻壤，鮮遠行，寡交遊”。這樣一個只讀過兩年多村塾和學堂書的農村青年和外界是沒有什麼接觸或交往的。在店口明誠學堂的短暫就讀中他才知道城市還有報刊和出版社，並訂閱了不少報刊。他自幼至二十歲左右日夜苦讀，也覺得有所心得而想形於紙筆。因此他的文章逐步出現在上海《神州報》《東方雜誌》等刊物上。到一九一五年他二十五歲時，商務印書館以單行本出版了他的《小說考證》前十卷，這個農村青年的姓名和學問逐漸為學界所知，並引起了清末民初學者蔣智由（觀雲）先生的注意。觀雲先生（一八六五——一九二九）別號因明子，當時與黃遵憲、夏穗卿並譽為“詩界三杰”。

在日本留學時曾一度任《浙江潮》編輯，與時人梁啟超、章太炎等有深交，與蔡元培等一起創立“中國教育會”，並參加過光復會。魯迅、許壽裳、錢玄同等均曾登其門，有不少著述傳世。他注意的原因據說有二：其一是這個初出茅廬的人也姓蔣，是他的同姓；其二是文壇從未聽到過此名，但文章中可以看讀過不少書。好奇心促使他向出版社查詢，得知是和他的老家相距不足十里的黃稼埠人，因此有望一見。觀雲先生和前文提到過的我村塾師被尊稱為太先生是同村人。他問太先生你在黃稼埠坐過館，可認識其人。太先生回答不僅認識，蔣瑞藻和其父都是我的學生。觀雲先生說你給我先招呼一下，我將去拜訪他。太先生把觀雲先生的打算告訴先父，先父聽後又喜又驚。因為蔣智由是文壇巨子，著作很多，是當時學界名人。他的兒子蔣尊簋（伯器）還做過浙江省的都督等，我們鄉下人稱他為“老太爺”。先父為此寫了一封信給他，信中大致是說對觀雲先生很敬仰，也希望一見，長幼有序，若觀雲先生先到我家訪問，實在不敢當，希望當觀雲先生回鄉，將登門拜訪等。不久就收到觀雲先生的回信，這封信收在《新古文辭類纂》的第二十卷中。信中稱先父為“宗兄”，這封信收到後不久，觀雲先生居然提着一根手杖到我家來登門訪問了。這件事在我村引起了轟動，一個文化界巨子又是浙江省都督的“老太爺”居然登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之門。兩人從上午一直談到傍晚才分手，從此結成了忘年交。

其後觀雲先生建議先父應該外出工作，工作也不影響讀書，先父和先母商量後同意了觀雲先生的建議，就經他推薦，前往上海澄衷學堂教書（最近上海澄衷高級中學囑我復印了蔣觀雲所作